

从“自由灯塔”到“世界领袖”：两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国际角色认知的转变

王立新

【摘要】从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美国精英们虽然抱有以共和主义改造世界的理想,但相信美国应该专注于国内的“共和实验”,以榜样的力量而非对外干预行动来影响世界,扮演“自由灯塔”而非“自由十字军”的角色。一战爆发后,威尔逊试图重塑美国人的国际认知,说服民众放弃孤立主义并支持美国在战后发挥世界领导作用,但没有成功。到二战结束时,美国朝野终于达成共识,认识到美国不应该满足于做“自由灯塔”,还应该成为战后的“世界领袖”,承担起领导世界实现和平与繁荣的责任。美国精英们对美国国际角色认知的改变既是美国实力迅速增长和国际环境巨变的结果,更与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有关。特别是二战的悲剧使美国民众意识到,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与外部世界息息相关,美国有必要通过对国际事务的主导塑造有利于美国的世界环境。美国从此走上了全球干涉和霸权护持之路,对美国自身和整个世界都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自由灯塔;世界领袖;国际角色;威尔逊;杜鲁门;二战教训

【作者简介】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0~61

公开声称自己的国家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是当代美国领导人习以为常的行为,拜登总统上台以来已有数十次在公开场合谈及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global leadership)。^①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5月28日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上,更是直言不讳地告诉台下年轻的军官们,美国面对的任务“不是美国是否将发挥领导作用,而是我们将如何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必须始终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没人会这么做”。^②实际上,视美国为“世界领袖”几乎是哈里·杜鲁门以来历届美国总统在讨论美国的国际角色和国际地位时的一致信念,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还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未曾动摇美国人的这一信念。不过,美国人的这一国际角色认知并非从美国建国伊始就有的,从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尽管美国已经从边缘小国崛起为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但是,美国人一直认为美国恰当的国际角色是成为“共和典范”和“自由灯塔”,通过完善自己去影响世界,而不是充

当解决世界纠纷、维护全球稳定的领导者。实际上,一直到二战爆发前,多数美国人对世界领导角色仍然避之唯恐不及。只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化,特别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后,美国社会才逐渐形成共识:美国的实力地位和世界事务的变化使美国无法回避自己的国际责任,美国必须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这一角色认知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也深刻影响了二战后直至今天的国际关系和人类生活。本文拟追溯美国精英们对美国国际角色认知的变化过程,分析其变化的根源,以深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认识和理解。

一、“自由灯塔”：一战之前美国人的国际角色认知

在建国之初,作为一个共和国,美国是君主制和帝国体制包围下的一个孤岛,不仅国力弱小,而且还在进行成败未知的“共和实验”。国父们虽然对美国的未来非常乐观,相信美国的共和体制迟早会使美国成为令世人尊敬的强大国家,但在他们心中,美国当时的任务显然不是主动传播美国的共和理想,通

过向外投射力量与欧洲列强一较短长,而是努力完成伟大的“共和实验”,向仍然遭受君主专制压迫的其他国家人民展示“自由的赐福”,用榜样的力量影响世界。用乔治·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的话说,“美国将无愧于一个自由、开明的国家,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为人类树立一个宏伟崭新的始终以崇高的正义和仁爱为指导的民族的榜样”。^③托马斯·杰斐逊也有类似的看法,相信美国共和政治的榜样力量将影响世界。他在1801年3月写给约翰·迪金森的信中认为,美国成功地“维护一个公正而稳固的共和政府将成为一座耸立的纪念碑和其他国家人民追求和模仿的榜样”,其他国家的人民“将从我们的榜样中看到一个自由的政府是所有政府中最有活力的”,从而受到“激发”去做自己的“探索”,这样就会“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改善人类的状况”。^④

在早期建国者的心中,美国是一座“自由灯塔”,对世界的影响在于其发出的光芒而不是主动的对外干预行动。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21年7月4日独立日演讲中说,美国“将通过声援和树立榜样”的方式来支持各国“自由和独立”的“普遍事业”,但“美国不会到国外去寻找魔鬼(devils)加以消灭”。^⑤也就是说,美国不会充当“自由的十字军”,介入其他国家的事务,到海外去“讨伐”自由的敌人。建国者们对美国国际角色和地位的这一认知后来被一代又一代美国人继承。内战时期,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北军中士塞缪尔·麦吉尔韦恩(Samuel McIlvaine)认为,美国是“指引世界其他地区的星辰和整个人类的自由灯塔(beacon light of liberty & freedom)”,他参军的目的保卫这一灯塔。^⑥林肯总统则称美国是“人类最后最好的希望”,^⑦镇压南部的叛乱就是为了为了子孙后代保留这一“希望”,而内战的结果将检验“孕育于自由之中”的这个国家“能否长存”。^⑧一直到19世纪末,美国一直专注于美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改善,满足于以榜样的力量影响世界,在对外关系中奉行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避免介入西半球以外的事务和参与解决世界的问题。这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

在19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随着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一共识开始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批鼓吹“大政策”(large policy)的帝国主义者主

张美国应该追求与其强大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承担去“教化”落后民族的所谓“白种人的责任”。19世纪末围绕殖民菲律宾问题的外交大辩论,本质上就是关于美国国家角色的辩论:美国究竟是继续满足于扮演“自由灯塔”的榜样角色,只是以自己的光芒去“照亮”黑暗的世界,还是像银行家富兰克林·麦克维(Franklin MacVeagh)所说的那样,放弃自我孤立,“关心整个人类”,主动参与大国之间的权力角逐,“不仅促进其自身的提升,而且促进世界的提升”。^⑨这场大辩论虽然未能阻止美国兼并非律宾,却成功地阻止了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进入20世纪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表现活跃,包括发起泛美会议、调停日俄战争、调解法德冲突,试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更有力的作用,但这一系列行为并没有突破国父们为美国设定的国际角色,也鲜有政治家提出美国应该追求世界领导地位。参议院在批准1906年的《阿尔赫西拉斯协定》(Algeciras Agreement)和1908年的《海牙公约》时特别附加一条但书,称“无意背离美国的传统外交政策”。^⑩具有“牛仔”作风、主张美国应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有为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偶尔会谈及美国的“领导地位”,但仅仅是就工商业领域而言的。^⑪在罗斯福看来,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获得是在未来,而不是现在。^⑫1909-1913年间担任总统的霍华德·塔夫脱在公开演讲中从未提及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角色或领导作用。

简言之,从建国伊始直到20世纪初,美国满足于扮演“自由灯塔”的角色,避免卷入欧洲的事务,无意追求世界领导地位,专注于在北美打造一个令人羡慕的共和体制和自由社会,主要通过完善自己而非对外干预来影响外部世界。

二、一战与威尔逊重塑美国国际角色努力的失败

一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宣布中立,试图置身于战争之外。但是,随着战事的进行,战争逐渐对美国的安全和利益构成巨大的威胁,特别是德国实施的潜艇战,不断造成美国人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美国的中立政策越来越难以执行。美国政府,特别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越来越意识到,专制的德国不仅侵害美国的利益,而且威胁着民主制度本身,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加入战团。而一旦参战,美国就不可能对战后媾和与国际秩序的重建袖手旁观。威尔逊甚至

认为,为了维护美国的长远利益和避免战争的重演,美国应该抛弃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并在战后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以维护美国的利益和世界的持久和平。而不论加入欧洲的战争,还是在战后领导国际秩序的重建,都需要改变美国人民狭隘封闭的世界观和对国际事务不闻不问的态度,接受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新角色。大体上从1916年开始,威尔逊开展对民众的说服工作,通过一系列公开的演讲,重新阐释美国的国家特性与世界地位,试图把美国的国际角色从“自由灯塔”改造为“世界领袖”,引导民众走出孤立主义,支持美国成为战后的领导国家。

威尔逊从三个方面来论证这一新角色的必要性:一是美国国力的强大和“共和实验”的成功;二是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三是外部威胁的严重性。

在威尔逊看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和实力,因此美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做好了向世界展示美国能够领导人类走向光明之路的准备”。^⑬同时,美国的强大也表明国父们开启的“共和实验”已经“成功”,民主已经成为切实可行、普遍适用的政治模式。威尔逊说:

就在不久以前的美国革命时代,民主在世界上被认为是一种实验,我们被认为是轻率的实验者。……但是证明试验成功的那一天已经到来了。我们现在知道,世界也知道,我们那时似乎草率承担的事情已经切实可行,我们已经在世界上建立一个由普遍良知和信仰维护和促进的政府。^⑭

不仅如此,美国在20世纪初期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已经与19世纪大为不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技术进步、贸易发展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在威尔逊看来,“世界不再被划分为各种利益小圈子,世界不再由不同的地段组成,世界被共同的生活和利益联结在一起,这一点是以前从未有过的”。^⑮正因为世界各国利益相连,休戚与共,美国不应该继续做“孤立、封闭以及与世界重大力量没有联系的时代所做的事情”,“孤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⑯

既然美国已经强大,“共和实验”已经成功,而国际环境又发生了巨变,国父们在共和国早期确立的处理外交与国际事务的原则也就过时了。威尔逊称,“托马斯·杰斐逊时代的环境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环境是不可比的”,美国无法继续“从托

马斯·杰斐逊的事迹中获得榜样”。^⑰美国“不能再禁锢和限制自己”,“不管我们如何选择,我们都肯定要在世界上扮演更大的角色”。^⑱

威尔逊认为美国应该积极介入国际政治的第三个必要性是民主制度面临巨大的威胁,这一威胁来自普鲁士专制政府的崛起及其挑起的战争。德国挑起的战争虽然没有威胁美国的国土安全,但已经威胁到美国民主制度的安全和世界人民的自由,美国不能置身事外。威尔逊称,“专制政府的存在”就是“对和平与自由的威胁”,在一个存在德国这样强大专制国家的世界上,“民主制度的安全不可能得到确保”。因此,美国不应该像过去那样继续对国际事务漠不关心、孤芳自赏,美国需要为“世界和平和世界人民的自由而战”,“世界必须确保民主的安全,世界的和平必须建立在可信赖的政治自由基础之上”。^⑲

也就是说,美国不能继续满足于仅仅做“自由灯塔”,还应该在全世界积极促进和保卫自由,成为“自由的卫士”。威尔逊诉诸神意,称是上帝让美国成为“确保人类能享受自由的工具”。^⑳“这个伟大的国家正在迎来新角色和新责任”,但“这不是美国精心规划的结果,而是率领我们走上这条道路的上帝之手带来的”。因此,“我们不能拒绝,而只能以高远的眼光和饱满的精神前进,去跟随上帝的指引”。^㉑

威尔逊为美国打造的国际角色直接否定了国父们的设想,美国不仅“捍卫”自己的自由,而且还要去国外寻找自由的敌人——约翰·昆西·亚当斯所说的专制“魔鬼”——加以消灭,充当整个人类权利的“捍卫者”。威尔逊称,美国积蓄力量就是要“为人类的权利而战”。^㉒

战争的结果是专制德国失败,民主阵营获胜,对自由的威胁已经消失了,美国还要继续介入欧洲政治吗?威尔逊声称,美国不能重新回到孤立的状态,因为“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战争也“已经结束了我们的孤立,并赋予我们很大的义务与责任”。^㉓这一责任就是领导世界构建战后国际秩序和维护持久和平,避免一战那样的悲剧重演。在说服民众支持国联计划和国会批准《凡尔赛和约》的一系列演讲中,威尔逊声称“美国是唯一能在组织和平方面对世界进行富有同情的领导的国家”,^㉔也是“世界上唯一能让世界接受其领导和指引

的国家”，“如果我们不给予这种领导……那么我们就将是世界上最不负责任的民族”。^⑤

威尔逊告诉美国人，世界各国也指望美国的领导。“整个世界已经伸出手来，转向我们这个上帝保佑的国家，说‘如果你们出来领导，我们将跟随’。”而在其他国家“追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领导”，“这个伟大的国家……将走在长长队伍的前面，眼望着不朽的目标，攀登那些高峰”。^⑥

通过一系列的说服和教育，威尔逊试图在美国已经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形势下，利用美国卷入一战和领导战后媾和的机会重塑美国民众对美国国际角色的认知：美国不再仅仅是独善其身的“共和榜样”和“自由灯塔”，同时还应该是领导世界维护战后和平与促进繁荣的“世界领袖”。

威尔逊的说服工作无疑起到了战争动员的作用，但是其让美国加入国联、通过国联领导世界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美国的主流民意和国会不认同，也不希望美国扮演威尔逊所追求的“世界领袖”角色，担心扮演这一角色会让美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危害美国的民主和安全。国会经过多次辩论和投票也未能批准《凡尔赛和约》，拒绝让美国加入国联。

三、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二战与美国国际角色认知的转变

威尔逊之后的三位共和党总统——哈定、柯立芝和胡佛都明确反对美国加入国联，拒绝卷入欧洲的政治事务。他们只是偶尔地谈及美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占据“道德领导地位”(moral leadership)，^⑦也就是发挥示范和调停作用，实际上又回到一战前的美国国际角色定位，对威尔逊所追求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领导角色没有兴趣。大萧条爆发后，美国社会笼罩着浓重的孤立主义气氛，即使那些威尔逊的追随者们也对发挥世界领导作用失去了兴趣。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后，拒绝在1933年的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与各国合作，不认为美国有责任领导世界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反而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政策。面对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力量的崛起及其发动的战争，美国竭力保持中立，不愿意领导民主阵营阻止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的侵略。

但是，二战的爆发让越来越多的美国精英认识

到，美国在一战后拒绝加入国联、回避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责任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正是这一错误加剧了世界经济危机，放任法西斯势力的扩张，并最终使整个世界再次陷入战火之中。美国必须纠正这一错误，改变外交路线，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运用美国的巨大实力干预国际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最先觉醒的是那个时期最有影响的媒体人之一亨利·卢斯。卢斯在1941年2月17日的《生活》杂志上发表《美国世纪》一文，讨论美国的国际新角色和领导责任。卢斯称：

在国家政策领域，美国的根本问题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当他们的国家在20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时，美国人却未能从精神上 and 实际行动上使自己适应这一事实。因此，他们没有能够扮演作为一个世界性强国的角色——这种失误给他们自己和整个人类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挽救这一失误的办法是，全心全意地接受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国家的责任和机会，并随之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的，使用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向世界施加我们的全部影响。^⑧

卢斯所说的“接受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国家的责任”，就是领导世界抵御法西斯国家的扩张，恢复世界和平。卢斯认为，美国本来在一战后就应该承担起这一责任，但是美国拒绝了这一责任，其结果就是灾难性战争的再次爆发：

在1919年我们拥有一个黄金的机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机会去承担世界领导责任——这是一个放在天下闻名的银盘子里递给我们的黄金的机会，但是我们并不理解这一机会。威尔逊错误地处理了它，我们拒绝了它，但机会仍然存在那里，20年代我们把它搞砸了，在30年代的混乱中，我们把它葬送了。领导世界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但是，在我们所有人的帮助下，罗斯福一定能在威尔逊失败的地方成功。^⑨

卢斯告诉美国人，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偶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美国已经是世界的智力、科学和艺术的中心”，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无法定义、明确无误的领导标志——威望”。这使美国与历史上的那些世界帝国——罗马、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和19世纪的英国——都有所不同，世界

人民“对整个美国人民的善心、终极智慧和力量”抱有极大的信心。因此,美国完全有资格“领导世界”。^②

卢斯指出,作为世界大国,美国要在20世纪扮演四重角色,这也是美国为20世纪提出的“愿景”(vision):

一是在经济领域,美国要让自由经济企业制度获得胜利,成为海洋自由的主要保护者和世界贸易的领导者。

二是在技术领域,美国人将向全世界传播其技术和艺术技能,成为工程师、科学家、医生、电影人、娱乐制作人、航空公司开发商、道路建设者、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三是在慈善和人道领域,美国人将“成为全世界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承担起养活世界上所有由于这场世界范围内文明崩溃而陷入饥饿和贫困的人的责任”,“我们在军备上每花一美元,就应该在尽力养活世界人民方面至少花一角钱”。

四是在思想领域,美国将积极献身于美国的伟大理想,包括“对自由的热爱,对机会平等的信念,自力更生、独立与合作的传统”以及“正义、对真理的热爱和仁爱的理想”。这些理想的传播“将把人类的生活从野兽的水平提升到《诗篇》作者所说的比天使低一点的水平”。^③

如果说在主张美国追求世界领导地位的问题上,一战时期的威尔逊还是形单影只的独语者,那么此时的卢斯已经有了一大批追随者。《美国世纪》一文发表后在美国引起强烈的反响,既有赞扬,也有尖锐的批评。^④但除了少数孤立主义者外,无论是赞扬者还是批评者,大多都认同卢斯对美国国际角色的定位:美国必须吸取一战后的教训,承担起与美国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在战后领导世界走向和平与繁荣。这一点在战争后期逐渐成为美国朝野和两党的共识,两党的领袖人物纷纷发表文章或出版著作,大谈美国的国际责任和领导角色,以防止美国重蹈一战后的覆辙。这些人物包括:左翼国际主义者、曾担任罗斯福政府副总统和农业部长的亨利·华莱士,罗斯福政府的副国务卿、民主党人萨姆纳·韦尔斯,共和党自由国际主义者温德尔·威尔基以及战时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早在美国卷入战争前,亨利·华莱士就指出,一

战后“对正常状态和孤立的渴望导致我们的人民拒绝接受给他们带来的世界责任”,成为“孤立主义者”,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⑤华莱士非常担心孤立主义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会卷土重来,提醒美国人,“不仅这个国家的整个未来,而且人类文明本身的未来,可能取决于美国人民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放眼世界”,“看到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占据世界领导地位,支持与其他国家进行合理合作的政策和安排”。^⑥华莱士说:“与世隔绝的安逸日子结束了,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必须日复一日地与国际大家庭生活在一起,发挥我们的领导作用。”^⑦

作为一位左翼国际主义者,华莱士认为走出孤立主义、扮演领导角色的美国不能追求帝国主义目标,而应该与世界各国合作,迎接“平民世纪”(Century of the Common Man)的到来。美国“必须更关注福利政治,而不是权力政治;更关注各国原材料的平等使用,而不是容忍冻结国际市场的掠夺性政策和以货易货政策;更关心开放商业通道,而不是通过禁止性关税关闭商业通道;更加注意所有国家对稳定货币的需要,而不是实行高额贷款利率”。简言之,就是“肩负起进行启蒙、大量生产和进行世界合作的责任”,以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⑧

民主党内另一位坚定的国际主义者是曾担任罗斯福政府副国务卿的萨姆纳·韦尔斯。韦尔斯与卢斯和华莱士抱有类似的看法,认为正是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外交错误导致了二战的爆发,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美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和领导世界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1942年5月30日,韦尔斯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发表演讲,称美国在一战“被赋予了通过参与国际组织分担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以实现其伟大理想的机会”,但是“美国拒绝了这一机会”,在此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作为一个民族不仅经历了物质上极端自私的时期,而且令人难以置信地盲目”,其结果就是爆发“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这是“我们自己的愚蠢和缺乏远见而带来的苦果”。而挽救的办法就是打败法西斯势力,并“领导世界建立一个可以保障不虞匮乏的自由的国际秩序”。^⑨

1944年,已经辞职的韦尔斯出版《决定时刻》,继续阐发这一思想。在韦尔斯看来,美国早期的外交

曾经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早期政治家们了解世界政治的潮流和趋势。20世纪初,美国民众也支持罗斯福、塔夫脱和威尔逊的外交政策,支持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在美国参加一战以及签订《凡尔赛和约》时达到高潮。但是,围绕批准《凡尔赛和约》和加入国联问题的纷争逆转了这一潮流,主流舆论反对国际合作的政策,其他国家也不相信美国会承担长久的国际义务。此后,美国外交犯了一系列错误,其中“最大的错误是拒绝参加国际联盟”,虽然国联的失败与其他大国玩弄强权政治、追求自私的国家野心和国联理事会缺乏远见有关,“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美国)从一开始就愿意加入联盟,那么许多造成灾难的原因肯定会被消除”,“当前蹂躏人类的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②

韦尔斯认为,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包括维护国际和平和美国的独立与完整、确保美国民主体制的安全、不断提高美国人民生活水平以及保证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贸易和利用天空与海洋等。而“确保实现这些目标的唯一途径是建立一个国际组织,通过这个组织,地球上的人民可以为他们的安全与繁荣进行合作,美国应该承诺与这个组织全力合作”。这是美国从过去学到的教训,并“应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未来的基石”。韦尔斯最后说: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人民再次被赋予了向其他国家提供合作和领导的机会……去帮助建立一个他们和所有人民都能安全生活的世界。他们现在所做的决定将决定其命运。^③

温德尔·威尔基是共和党领袖、194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虽然从未担任公职,但有杰出的口才和强大的个人魅力,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普通民众以及主流媒体的注意。他于1943年4月出版了《天下一家》(One World)一书,目的是在战争结束之前,通过对战争目标的讨论和传播国际主义思想,让美国民众放弃褊狭封闭的世界观,转向开放包容的全球视野,以免重蹈一战后的覆辙。^④威尔基在书中回顾了美国在两战之间所犯的错误,指出一战后美国放弃了威尔逊设计的国际合作路线,“进入了一个与世界事务最为隔绝的时代”,“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牺牲了一个发挥领导作用以加强和恢复民主国家、使它

们免受当时开始集结的侵略力量攻击的伟大机会”。而民主、共和两党对此都负有责任,共和党领导层在1920年摧毁了国际联盟,民主党领导层则在1933年打碎了伦敦经济会议。^①威尔基声称,“我们必须再次决定美国是否将在世界事务中占据适当地位的時刻即将到来”,如果在这场战争后美国又一次“回避世界的问题和责任”,必将带来新的灾难。^②美国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必须在使世界获得自由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③世界各国人民也“热切地等待着我们接受历史上最具挑战性的机会”,“帮助创造一个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们都可以在独立和自由的激励下生活和成长的新社会”。^④《天下一家》出版后曾连续四个月高居《纽约时报》最畅销非虚构类著作之首,影响巨大。

1944年4月,威尔基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为了避免一战和二战这种灾难“周期性地发生”,美国必须放弃传统的主权观念,“建立和运作一个国际组织”,“承担共同的责任”。“如果我们决定这样做,我们可能会成功地翻开25年前我们摸索但未能翻过的历史的一页。如果相反,我们决定继续我们在上一场战争之后所采取的静态、被动和基本上令人恐惧的孤立主义政策,我确信我们将进入第三场战争。”^⑤在威尔基看来,战后美国面临的许多棘手问题,无论是科技、文教、经济还是政治问题,都“只有通过国际行动才能解决”,而“在与盟友的合作中,我们仍将凭借我们人民的力量和聪明才智成为领导者”。“运用这种领导地位为我们自己和人类谋福利,不会削弱美国人民的主权,而是会扩大这一主权,并使其更真实。”^⑥

作为威尔逊的追随者,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无疑希望美国人民能够支持国际合作,支持美国在战后扮演世界领导角色。不过,战争前期,罗斯福把主要精力用在如何赢得战争而不是规划战后和平上,对美国的领导地位问题也很少提及。到了1944年,当罗斯福谋划战后国际秩序的时候,他也担心一战后的悲剧会重演,开始以总统身份对民众进行国际主义教育。与当时很多意见领袖和领导人一样,罗斯福教育美国民众的主要话语是相互依赖论和国际责任论:技术进步导致相互依赖,相互依赖使孤立主义不再可行;国家实力带来国际责任,国际责任赋予

美国领导世界的机会。罗斯福把实力、责任和国家的成熟联系起来,认为一个国家只有愿意承担与其力量相称的国际责任才算走向成熟。

在1944年10月21日外交政策协会晚餐会的演讲中,罗斯福称在过去几年间美国人民进行了多场全国性的大辩论,这些辩论“波及了每个城市,每个村庄,甚至每个家庭”,辩论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

这个国家获得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尤其是道德力量,给我们带来了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领导作用的责任和机会。这是我们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且以和平与人道的名义,这个国家不能,决不能,也不会推卸这一责任。

罗斯福称这是一个“经验丰富、老练成熟的民族的判断”,“美国已经成为这样的民族”。“我们将承担我们的全部责任,发挥我们的全部影响力,并向所有渴望和平与自由的人提供我们的全部帮助和鼓励。”^④

领导反法西斯同盟打败轴心国的美国在战后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胜利和超级大国地位进一步激发了美国人的自豪感和精英们的国际抱负。战后初期也成为集中讨论美国的国家特性和世界角色的重要时期,其中的主导性话语是战争胜利表明了美国的强大和优越,强大和优越意味着国际责任,此时的国际责任就是为世界提供物质、道德和政治上的领导,以避免二战悲剧的重演。这一话语的主要阐述者是接替罗斯福担任总统的哈里·杜鲁门。

杜鲁门宣誓就任总统后,在参众两院的演讲中称,“美国已经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正义力量之一”,“取得了世界领导地位”,“全世界都在期待美国以开明的方式领导和和平与进步”。^⑤在日本投降前后的几次广播演讲中,杜鲁门颇为自得地宣称美国“已经从这场战争中崛起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许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⑥而“伴随我们的力量而来的是巨大的责任”,以及美国“在世界上捍卫正义与和平的持续领导意识”。^⑦杜鲁门称,胜利意味着“喜悦”,但也意味着“负担和责任”,美国“满怀信心和希望地面对未来及其所有危险”。“一个能够开发出原子武器的自由民族同一个自由的联盟一道,可以运用同样的技术、精力和决心去克服未来的

一切困难。”^⑧“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我们赢得的胜利已经把领导世界的持续重担放到了美国人民身上。”^⑨“我们不能逃避我们在战后世界的领导角色。”^⑩

与卢斯和罗斯福等人一样,杜鲁门也多次从吸取历史教训的角度来论证美国承担领导责任的必要性。杜鲁门称,在1920年,上帝“有意让这个国家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希望我们带领世界走向和平”,但美国“逃避了这一责任”,其结果是二战这样的巨大灾难,现在上帝“又一次把同样的责任交给了我们”,“这次我们不会逃避,我们将按照他对我们的要求承担起这一责任”。^⑪

在杜鲁门心中,美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包括:对因战争蹂躏而陷入饥饿的人进行救济,并帮助重建世界经济;通过捍卫和传播美国价值观为因战争而陷入迷茫的世界提供“方向”和道德“领导”;通过建立和领导国际组织来确保持久的和平。

当时美国很多媒体,特别是亨利·卢斯创办的《时代》《生活》等杂志也不遗余力地在民众中宣传美国应该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

《生活》杂志在1945年7月1日的一篇社论中引用了共和党外交政策发言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话,认为“随着战争的结束,原则和道德必须在世界上重建”,而美国“应该在这方面发挥带头作用”,“我们有责任在恢复原则成为行为指南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世界就不值得生活”。^⑫该杂志在1947年1月连续三期发表社评,讨论美国对外政策,称以“恐惧、仇恨和民族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欧洲的旧模式必须被取代”,而“美国的领导地位使其有能力来促进实现这一点”。^⑬

《星期六晚邮报》1945年12月的社论提出美国应该做出一些物质上的牺牲,为世界提供救助,这不仅可以“让世界从深渊中走出来”,从而使美国获得“满足感”,而且还可以“让欧洲从无政府状态下摆脱出来”,从而有利于美国的安全。重要的是,“在应对所有这些全球苦难的挑战时,美国将找到机会,重新获得在争取和平与经济复苏斗争中的领导地位”。^⑭

1946年3月,《柯林斯》(Collier's)杂志发表社论,认为美国应该扮演“世界裁判”(world umpire)和“世界

领袖”(world leader)的双重角色,调解英国和苏联的分歧,并“在世界事务中提供积极、建设性的领导,这对英国、俄罗斯和大多数其他国家来说都是可以接受和追随的”。社论认为,美国的世界领导角色主要是一个国家意志的问题,“如果我们下定决心去做,我们就有能力和世界声誉去扮演这个角色”。社论随附的漫画显示,山姆大叔站在地球上,双手握着缰绳,一条缰绳上标有“调解”(conciliation),另一条标有“领导力”(leadership),有了这些工具,山姆大叔可以驾驭这个棘手的世界。^③

大体说来,二战结束后,让美国承担全球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精英的共识,无论是亨利·卢斯这样的共和党右翼国际主义者还是亨利·华莱士和萨姆纳·韦尔斯等左翼国际主义者,抑或杜鲁门等自由国际主义者,都支持国际合作和美国的世界领导角色。虽然仍有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A. Taft)等人继续坚守孤立主义立场,但孤立主义者人数越来越少,其声音也越来越被边缘化。按照历史学家约翰·福赛克的说法,“孤立主义标签已成为被用来攻击政治对手的刷子,成为一种诽谤和进行人身攻击的形式。如果个人、出版物或组织是‘孤立主义者’,如果他们质疑美国负有全球责任的想法,那么他们关于世界事务的任何言论都不值得认真关注”。^④

其中,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的转变最有代表性,也最有示范效应。范登堡反对新政,反对美国卷入欧洲的局势,是珍珠港事件前著名的孤立主义者。但战争的经历彻底改变了范登堡的国际观,他于1945年1月10日在参议院发表轰动一时的演讲,宣布自己转变为国际主义的信奉者和支持者。范登堡在演讲中说:

坦率地讲,我过去一直是相信美国可以靠自己保障安全的人之一。……现在,我不再相信今后任何国家仅仅依靠自己的行动就可以免遭攻击。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大规模谋杀的血腥科学带入了新的险恶思想中。我们的大洋已不再是能够自动保护我们这一城堡的护城河。血肉之躯在与钢铁翅膀进行不平等的较量,战争已经成为一种消耗一切的巨大力量。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幸到来,它将开启可怕得难以想象的新的

死亡实验室,我建议在我们的能力所及范围尽一切努力让这种实验室永远关闭。我希望美国进行最大程度的国际合作……以确保敦巴顿橡树园基本理念的成功。^⑤

范登堡提出,维护战后和平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各国单独行动,另一种是通过国际合作和联合行动。“第一条路是在四分之一世纪内两次将我们带到欧洲没完没了的战场的老路;第二种方式是把我们现在的战时兄弟会(fraternity of war)变成新的和平兄弟会(fraternity of peace)的新道路。我不相信我们或我们的盟友可以同时采取两种道路,它们是互相抵消的。……我们必须做出选择。”^⑥

范登堡的参议院演讲极具象征意义,标志着孤立主义的急剧衰落。范登堡后来回忆说,他发表该演讲的目的就是“从我们这些在珍珠港事件前就被称为‘孤立主义者’的人的立场出发,阐明并坚定地维护美国的(国际合作)立场”。^⑦

范登堡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会后向参议院提交了一份报告,称《联合国宪章》的签署“是朝着国际谅解、合作与友谊迈出的一大步,而国际谅解、合作与友谊是和平、进步与安全不可或缺的。……美国从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两场战争阴影下的痛苦经历中知道,我们不能完全依赖自己来生活”。^⑧

范登堡在1946年4月28日的日记写道:“再也没有慕尼黑了!……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就必须表现得像世界头号强国那样。我们必须是世界的道德领袖,否则世界将没有任何道德领袖。”^⑨

当时著名的政治评论家、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对范登堡的转变做出这样的评价:

当在危机中一个突然而巨大的观点改变变得势在必行时,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看到一个我们所认识和信任的人,一个像我们一样思考和感觉的人经历改变主意的经历,以一种风格和冲劲去做,并以一种让自己为软弱的魔鬼感到羞耻的心情去做,这将让世界变得不同。^⑩

范登堡的“让世界变得不同”体现在其思想的转变带动诸多孤立主义者的转变,^⑪让美国社会各个阶层最后终于下定决心承担起与其力量相匹配的国际责任,支持美国发挥世界领导作用。

四、结语

经过长期的辩论、迟疑和徘徊,到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的精英和大众终于达成共识:为了美国的安全和利益,美国需要突破建国初期国父们为美国外交政策设定的藩篱,承担起领导世界的重任。美国人的国际角色认知因此完成了从“自由灯塔”到“世界领袖”的转变。此后,美国把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用今天的话来说,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视为国家的根本利益,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从孤立主义彻底转向国际主义和全球主义。

驱动美国国际角色认知转变的根本动力当然是美国国力的增长:到19世纪末,美国已经从世界边缘地区的弱小共和国崛起为世界强国,并在二战结束之时成为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但是实力地位的变化与美国角色认知的变化并非同步,远离世界舞台中心的地理位置、分权制衡的宪政原则和民众天然的孤立主义倾向极大地迟缓了美国追求世界领导地位的步伐,美国朝野在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半个世纪后才在美国是否追求世界领导地位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如果没有两次世界大战,很难想象在西半球孤芳自赏的国会深度卷入国际事务,干预遥远地区的局势,扮演起领导世界的角色。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和教训惊醒了美国人,使他们逐渐认识到,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与外部世界息息相关,美国有必要通过对国际事务的主导,塑造有利于美国生存和发展的世界环境。此后,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美国也由此走上了全球干涉和霸权护持的不归路,直至今天。

注释:

①最近的一次是在2023年5月21日七国集团东京峰会上,拜登声称“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非常重要。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in Hiroshima, Japan, May 21, 2023,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the-presidents-news-conference-hiroshima-japan>,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3月9日。此为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美国总统项目”在线资源(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除另外标注外,后文所引用的美国总统演讲均出自该线上资源。

②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in West Point, New York, May 28, 2014,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commencement-address-the-united-states-military-academy-west-point-newyork-3>,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3月9日。

③ Henry Steel Commager,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8, Vol. 1, p. 173.

④ Paul Leicester Ford,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97, Vol. 8, p. 8.

⑤ Walter LaFeber, John Quincy Adams and American Continental Empire: Letters, Papers and Speeches,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5, p. 45.

⑥ Allen C. Guelzo, Fateful Lightning: A New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35.

⑦ Second Annual Message, December 1, 1862,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second-annual-message-9>,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3月11日。

⑧ Gettysburg Address, Nov. 19, 1863,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address-the-dedication-the-national-cemetery-gettysburg-pennsylvania-gettysburg-address>,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6月16日。

⑨ Franklin MacVeagh, "Hail to the Chief. Superb Banquet is Tendered President McKinley by the Citizens of Chicago", The Duluth News Tribune, Oct. 20, 1898, p. 1.

⑩ Manfred Jonas, "Isolationism", in Alexander DeConde, Richard Dean Burns and Frederik Logevall,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Vol. 2,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2002, p. 342.

⑪ Second Annual Message, December 2, 1902,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second-annual-message-16>; Address at a Banquet Tendered by the Citizens of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at the Palace Hotel, May 12, 1903,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address-banquet-tendered-the-citizens-san-francisco-california-the-palace-hote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7月4日。

⑫ 西奥多·罗斯福在1903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赞扬美国“驯服了一个大陆”,“以一个大陆为基础建立了国家”,是“世界上最强大共和国”,坚信美国“将在现在这个开放的世纪上上升到其他民族从未达到的领头位置(headship)和领导地位(leadership)”。Remarks to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Good Roads Convention at Odeon Hall in St. Louis, Missouri, April 29, 1903,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the-national-and-international-good-roads-convention-odeon-hall-st-louis-missouri>,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7月4日。

⑬ "These are the Day That Search Men's Heart", Address at Jefferson Day Banquet, Willard Hotel, Washington, April 13, 1916, Woodrow Wilson,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1913-1917), edited by Ray Stannard Baker and William E. Dodd, 2 vols., New York: Harper, 1926, Vol. 2, p. 141.

⑭ "Democracy No Longer an Experiment", Address to the Grand Army of the Republic, Washington, Sept. 28, 1915, Wilson,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1913-1917), Vol. 1, pp. 371-372.

⑮ "America and the Rights of Humanity", Speech Delivered at Omaha, Oct. 5, 1916, Wilson,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1913-1917), Vol. 2, pp. 347-348.

⑯ "The Day of Isolation is Gone", Speech at Shadow Lawn at a Meeting of New Jersey Citizens, Nov. 4, 1916, Wilson,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 (1913-1917), Vol. 2, p. 391.

⑰ "These are the Day That Search Men's Heart", p. 143.

⑱ "Fighting is the Slow Way to Peace", Address before the Salesmanship Congress, Detroit, Michigan, July 10, 1916, Wilson,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Other Papers*(1913-1917), Vol. 2, p. 229.

⑲ "For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Germany",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pril 2, 1917, Woodrow Wilson,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edited by Ray Stannard Baker and William E. Dodd, 2 vols,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2002, Reprinted from the 1927 edition, Vol. 1, pp. 11, 14, 16.

⑳ "A Day of Noble Memories, A Day of Dedication", Address to Confederate Veterans at Washington, June 5, 1917, Wilson,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1, p. 55.

㉑ "Presenting the Treaty for Ratification", Address to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July 10, 1919, Wilson,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 Vol. 1, pp. 551-552.

㉒ "America and the Rights of Humanity", Speech Delivered at Omaha, Oct. 5, 1916, Wilson,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Other Papers*(1913-1917), Vol. 2, p. 347.

㉓ Annu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Dec. 2, 1919, Wilson,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Public Papers*, Vol. 2, pp. 430, 431.

㉔ At Auditorium, St. Paul, Minn., Sept. 9, 1919, Wilson,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Public Papers*, Vol. 2, p. 79.

㉕ At Minneapolis, Minn., Sept. 9, 1919, Wilson,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Public Papers*, Vol. 2, pp. 70-71.

㉖ At Minneapolis, Minn., Sept. 9, 1919, Wilson,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Addresses, Messages and Public Papers*, Vol. 2, pp. 75-76.

㉗ 哈定总统在就职典礼上指出美国“渴望在文明的道德领导(moral leadership of civilization)中占据崇高地位”。胡佛总统在1932年10月的演讲中称美国要努力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通过给个人以广泛的平等机会促进国家道德水平的提升,“建立美国在世界上的道德领导地位”。Harding's Inaugural Address, March 4, 1921,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inaugural-address-49>; Hoover's Radio Address to the Women of America, October 7, 1932,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adio-address-the-women-america>,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7月4日。

㉘ Henry R. Luce, "American Century", *Life*, Vol. 10, No. 7 (Feb. 17, 1941), p. 63.

㉙ Henry R. Luce, "American Century", p. 64.

㉚ Henry R. Luce, "American Century", p. 65.

㉛ Henry R. Luce, "American Century", p. 65.

㉜ 关于美国社会对亨利·卢斯《美国世纪》一文的反应,可参见 Henry R. Luce, *The American Century* by Henry R. Luce with Comments,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41; 王一哲:《亨利·卢斯“美国世纪”命题的提出及其影响》,《历史研究》2020年第6期。

㉝ "Our Second Chance", Address before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New York City, April 8, 1941, Henry Wallace, *Democracy Reborn*, edited by Russell Lord, New York: Reynal and Hitchcock, 1944, p. 176.

㉞ Henry Wallace, "Foundations of the Peace", *Atlantic Monthly*, Vol. 169, No. 1 (Jan. 1942), p. 36.

㉟ "George", Address at Connecticut College for Women, June 6, 1943, Wallace, *Democracy Reborn*, pp. 237-238.

㊱ "America Tomorrow", Address at Detroit, July 25, 1943, Wallace, *Democracy Reborn*, pp. 239, 240, 244.

㊲ Sumner Welles' Address on Memorial Day, May 30, 1942, <http://www.ibiblio.org/pha/policy/1942/420530a.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1年8月23日。

㊳ Sumner Welles, *The Time for Decisio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44, p. 304.

㊴ Sumner Welles, *The Time for Decision*, pp. 316-317.

④0 威尔基在书中说：“人民必须在战争中明确自己的目标。我有意地试图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挑起关于这些目标的讨论，因为我一直担心这场战争可能会在世界人民就其参战目的和战后愿望达成共识之前就结束了。我是上一次战争中的一名士兵，在那场战争结束后，我看到我们美好的梦想消失了，我们激动人心的口号变成了愤世嫉俗者的笑谈，这一切都是因为处于交战状态的人民在战时没有达成任何共同的战后目标。我们必须下定决心，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Wendell L. Willkie, *One Worl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43, p. 171.

④1 Wendell L. Willkie, *One World*, pp. 198-199.

④2 Wendell L. Willkie, *One World*, pp. 201-202.

④3 Wendell L. Willkie, *One World*, pp. 202-203.

④4 Wendell L. Willkie, *One World*, p. 206.

④5 Wendell L. Willkie, "Our Sovereignty: Shall We Use It?" *Foreign Affairs*, Vol. 22, No. 3 (April 1944), pp. 347-348.

④6 Wendell L. Willkie, "Our Sovereignty: Shall We Use It?" pp. 360-361.

④7 Radio Address at a Dinner of the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New York, N. Y., October 21, 1944, <https://www.presidency.ucs.edu/documents/radio-address-dinner-the-foreign-policy-association-new-york-n-y>, 最后访问日期: 2022年7月4日。

④8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April 16, 1945, <https://www.presidency.ucs.edu/documents/address-before-joint-session-the-congress>, 最后访问日期: 2022年7月18日。

④9 Radio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the Potsdam Conference, August 9, 1945, <https://www.presidency.ucs.edu/documents/radioreport-the-american-people-the-potsdam-conference>, 最后访问日期: 2022年7月18日。

⑤0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Universal Military Training, October 23, 1945, <https://www.presidency.ucs.edu/documents/address-before-joint-session-the-congress-universal-military-training>, 最后访问日期: 2022年7月19日。

⑤1 Radio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Terms of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by Japan, September 1, 1945, <https://www.presidency.ucs.edu/documents/radio-address-the-american-people-after-the-signing-the-terms-unconditional-surrender>, 最后访问日期: 2022年7月13日。

⑤2 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Recommen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epart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December 19, 1945, <https://www.presidency.ucs.edu/documents/special-message-the-congress-recommending-the-establishment-department-national-defense>, 最后访问日期: 2022年7月20日。

⑤3 Radio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the Status of the Reconversion Program, January 3, 1946, <https://www.presidency.ucs.edu/documents/radio-report-the-american-people-the-status-the-reconversion-program>, 最后访问日期: 2022年7月20日。

⑤4 Remarks on Presenting the Congressional Medal of Honor to Commander Richard H. O'Kane, USN, and Master Sergeant Charles L. McGaha, USA, March 27, 1946, <https://www.presidency.ucs.edu/documents/remarks-presenting-the-congressional-medal-honor-commander-richard-h-okane-usn-and-master-sergeant-charles-l-mcgaha-usa>; Informal Remarks in Nebraska, June 5, 1948, <https://www.presidency.ucs.edu/documents/informalremarks-nebraska>, 最后访问日期: 2022年7月21日。

⑤5 Editorial, "Human Rights and the Law", *Life*, Vol. 21, No. 1 (July 1, 1946), p. 25.

⑤6 Editorial, "U. S. Foreign Policy, II: This is the Year It Can Register Some Triumphs: For Example, in China and Europe", *Life*, Vol. 22, No. 2 (January 13, 1947), p. 22.

⑤7 "World Relief Is America's Job",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Vol. 218, No. 25 (December 22, 1945), p. 112.

⑤8 "Uncle Sam As World Leader", *Collier's*, Vol. 117, No. 12 (March 23, 1946), p. 90.

⑤9 John Fousek, *To Lead the Free World: 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N. 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 88.

⑥0 Arthur H. Vandenberg, "The Need for Honest Candor: Clarification of Our Foreign Policy",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Vol. 11, No. 8, February 1, 1945, p. 228.

⑥1 Arthur H. Vandenberg, "The Need for Honest Candor: Clarification of Our Foreign Policy", p. 228.

⑥2 Arthur H. Vandenberg,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 edited by Arthur H. Vandenberg, J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2, p. 130.

⑥3 Congressional Record, Senate, Vol. 91, Part 5, 79th Congress, 1st session, June 29, 1945, p. 6981.

⑥4 Arthur H. Vandenberg,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 p. 267.

⑥5 Arthur H. Vandenberg,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 p. xxi.

⑥6 当时有评论家指出，“有范登堡带头，其他很多已经发现自己想法过时的参众两院成员改变自己的立场就容易多了”，“通过改变自己，范登堡也改变了其他很多人”。Joseph and Stewart Alsop, "Taft and Vandenberg", *Life*, Vol. 21, No. 15 (Oct. 7, 1946), p. 108.